

明清伊斯兰教在运河沿岸的传播

郑自海

明代是中国伊斯兰教传播最迅速最广泛的关键时间。元末,朱元璋起义于“回回窝”,宋元被贬至豫南淮西的色目人,已经形成一庞大的群体后裔,扩散至凤阳、定远、寿县、怀远、临淮,与开封、郑州穆斯林连成一片。朱元璋重视起用回回人参军,有三点优势:1.回回人文化素质高,人品好;2.回回人团结;3.回回人善习武、善骑马。事实证明朱元璋起兵神速,快速组成骑兵队伍,正是起用了常遇春、沐英、冯胜、兰玉、冯国用、马镇、丁德兴、胡大海、常荣、马聚成等回回人,成为明初将领,为朱元璋江山立下奇功。民间相传“十大回回保洪武”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朱元璋建立政权以后,对伊斯兰教采取友好宽容的态度,首先敕建净觉寺,安置归附的回回人,并御书《至圣百字赞》赞颂穆罕默德为“至贵圣人”。一大批回回功臣进爵封王,定居南京。如常遇春居住在常府街,府前建起花牌楼和一座清真寺。各地的清真寺还纷纷将《至圣百字赞》刻碑立在寺内中,以表示朱元璋对伊斯兰教的重视,借助《至圣百字赞》保护自己。永乐五年,朱棣为苏州惠民寺特授敕谕:“所有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该碑相同内容又见于泉州清净寺、松江真教寺等清真寺,成为伊斯兰教护教之文。笔者手中还有一本由中国回国文化教育基金会出版、台湾马明道编著的《明朝皇家信仰考初稿》,书中例举大量事实论证了朱元璋为回回人,从目前看来,这种观点还不能达到共识,只能表明朱元璋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做过贡献。

明代,伊斯兰教在运河区域的重点传播与运河作为南北主要通商之路有着直接的关系,有着经商传统的穆斯林

沿着运河城镇经商定居。首先在明朝的南北二京形成一定规模穆斯林的集中居住区,在南京多次重修扩建净觉寺、六合南门清真寺,又增建了回回营清真寺、花牌楼礼拜寺、汉西门清真寺、湖熟镇清真寺等。在北京牛街清真寺、东四清真寺,几经重修扩建后,又增加了西花市清真寺、锦什坊街清真寺、长营清真寺、苕帚胡同清真寺、三里河清真寺、张家湾清真寺、马驹桥清真寺、于家湾清真寺、枣林庄清真寺、永乐店清真寺等,在河北省运河沿线创建了沧州清真北大寺、沧州建国清真寺、泊头清真寺、泊头清真东寺、泊头八里庄清真寺等。在山东境内始建枣庄清真寺、济宁东大寺、济宁柳行东寺、德州北营清真寺、临清老礼拜寺、大清真寺、临西洪官营清真寺、张秋清真东寺、枣庄清真寺、台儿庄北关清真寺等。在运河江苏段,清江(现为淮安)为什么会被人们称为运河之喉?早在永乐五年(1407年)朱棣下令在清江浦镇创办清江船厂,以满足漕运对船舶的需求,共建有京卫、中都、直隶、卫河4个总厂,下设82处分厂。沿运河20余里,每年能正常造船560艘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造船工匠云集清江,也将各种信仰、宗教带至清江,集中全国各种神庙宇在清江展现,来此经商造船的穆斯林建起清江第一座清真寺——清江古清真寺。景泰二年(1451年)设总督漕运都御史,驻淮安府,标志着淮安府成为运河漕运的中心地位。在扬州,永乐五年(1407年)米里哈只手持蒙、汉、阿3种文字书写的朱棣《敕谕》破天地大胆公开传教。信奉伊斯兰教者日益增多,并影响到菱塘地区。

在镇江被毁的古润礼拜寺迁址剪子巷扩建,明末镇江开始成为伊斯兰教

经书出版地之一,称为镇江版。常州的清真寺始建于明初,据《武进县志》记载:“真教寺在池子巷,明初以西域归化夷人安插各府,其人犹守故教,不食大豕,各府皆有寺。本寺初甚陋,万历年间知府马化龙,其先也归化人也,遂扩大之。”在运河之畔的苏州,明代时至少建有砂皮巷和丁家巷两处清真寺,更值得一提的是,赛典赤七世孙赛哈智于洪武二十六年专程太仓铁锚弄修建一座清真寺,方便来太仓经商和航运的穆斯林做礼拜。永乐年间,太仓作为郑和下西船队的集结地,更方便了以郑和为首的下西洋穆斯林官兵,完成伊斯兰教的“五功”。据目前所发现文献资料,赛哈智一生修建的西安、南京、太仓3座清真寺都与航海家郑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亲情、族情相结合的表现。

另外,在运河浙江段的嘉兴、杭州等地的许多清真寺也都始建于明代。明代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与明朝定都南京相关,数量可观的回回军驻扎南京,然后又随部队开拔到祖国各地,为了表示对大明王朝的顺诚之意,纷纷愿以南京为籍贯,以从“龙地”而来为荣耀。以致翻开众多回族家谱,都记载着祖籍南京“柳树湾、高石坎”,其实这两处地点都是明朝驻军所在地,“元代回遍天下”演变成“金陵回遍天下”。古代中国的交通有“北马南船”之说,自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南船也能北上。明代推行的屯耕政策,促进了运河沿线城镇穆斯林向农村迁移,形成运河农村地区伊斯兰教更广泛的传播,到明末,伊斯兰教在运河地区的传播,由线扩至成面的传播。

随着唐宋元明四大批回民迁居京杭大运河沿线,繁衍生息,人口数量成倍数增长,出现了更多的回民村落。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运河地区出现了一批“回儒”,他们是接受过很好的儒家文化教育的回族穆斯林,为了避免伊斯兰教逐渐衰微,回儒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伊斯兰教义必须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提高到这是中国挽救挽救的唯一出路。这场伊斯兰教振兴运动的领袖人物,便是王岱、张中、伍遵契、刘智和马注。除了学者马注来自云南,其余4人都出生于运河的核心区域。他们目睹了大批穆斯林官员在入仕教还是从教弃仕上进退两难的境地,例如海瑞、马文升等一批著名回族官员在寻找不出第三条道路时,便痛苦地与伊斯兰教疏远,最终完全离开伊斯兰教。再如,明初以常遇春为代表的这批回族高级将领,在他们归真后,朱元璋是按王位待遇厚葬的,墓前都安排了石人、石马,墓的形制变成圆形宝顶式。这种完全汉化的墓葬形式还表现在德州苏禄王墓、南京石子岗渤泥国王墓上。我们在南京将军山沐氏家族墓葬群还发现沐英的大墓中有带佛石的陪葬品。许多内地的穆斯林很难理解这一现象,更有学者直接怀疑明初一批回族将领的穆斯林身份。笔者结识一批沐英的后裔,的确有相当数量的沐氏后裔离开了伊斯兰教。但是居住在云南玉溪的沐氏一支,至今还保持伊斯兰教的信仰。

明代回族航海家郑和统率着各种宗教信仰的2.7万余名官兵,七次下西洋,各种信仰成为船员的精神支柱。郑和能将各种宗教“同舟共济”成功地组织领导成一支“和谐船队”成为明初最优秀的民族干部典范,从而更彰显了伊斯兰教的宽容和大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郑和参与佛教活动、妈祖祭拜等活动有了新的理解,郑和在最后



一次下西洋前夕,请求朝廷动用国库钱财重修南京净觉寺,始终坚持伊斯兰教的信念,最后以身殉职贡献给祖国的航海事业。

明清伊斯兰教在京杭运河经济发达地区与儒家文化强烈的碰撞,许多问题更加突现。一批“回儒”的产生是必然的。许多伊斯兰教的学者高度评价了这场运动,“一次真正的高度宣传运动,一次真正的护教图存运动,一次真正的归化鼎新运动。它对以后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和兴旺,对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强化和巩固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清末以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致后来清代灭亡,抗日战争等动荡的政局,直接影响了运河沿线广大穆斯林的正常生活。例如在太平天国时期,南京历朝修建的36座清真寺均遭破坏,常州两座清真寺在“洪扬之变”中被毁,扬州、镇江、句容、丹阳、苏州数十所清真寺都毁于兵燹。这时运河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更侧重于运河沿线农村的传播。

白寿彝教授早在1984年出版的《回族史论集》中就曾说过:“杭州到通县、沿运河两岸各地形成一个回回聚居地

带,其中,如杭州、苏州、丹阳、扬州和山东境内的一些地方,外加北京,在元时就有回回居住的,北方沧县和通县等地的回回,相传是‘靖难’之后由南方北迁的,这一长条的聚居地带,由山东境内的济宁、曹州和河南境内的开封、洛阳联系与陕西相通。在长江中下游、南京、安庆和武昌联系成一条线。这一条线,可以和运河联系起来。”由此可见,运河地区的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国回回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在运河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上,我们不仿看看安作璋教授在《中国运河文化史》中说过的一段话:“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加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源地齐鲁地区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更把汉唐的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和金、元、明、清以北京为首的文化中心连为一体,不断减少区域文化和差异而呈现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各个区域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同时也使运河区域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昌盛之区。”

(作者单位:江苏省郑和研究会)

大运河与苏州寒山寺的文化融通

闫卫平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诗《枫桥夜泊》中提及的寒山寺,以及月落乌啼、江枫渔火的画景,奇妙的钟声,如今成为苏州大运河保护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段。中国大运河2014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国务院确定的一项重要国家文化战略。目前大运河申遗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我国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递交申遗文本并通过审核。在理解大运河与寒山寺的相通之处方面,应把握以下三点:

历经岁月,生生不息 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地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至今大运河历史延续已2500余年。动态的、“生生不息”的精神是大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大运河自开凿之始到南北贯通,始终对中华大地上的自然生命、城市生命和文化生命的衍生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样貌呈现出“生生不息”的过程。中国大运河因变而生、因变而充满生机与活力。创生是大运河“生生不息”的动力;第一,大运河的开通,使江南和华北地区的自然生命获得了新生。第二,大运河的贯通缔造了无数运河城镇生命的新生。第三,大运河造就了文化生命的新生,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景观。第四,大运河的开凿使运河沿岸的生命形态得到了充分的养护。

寒山寺坐落在苏州城西古运河畔

枫桥古镇,创建于梁代天监年间(公元502年至519年),初名妙刹普明塔院,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相传是唐代贞观年间,高僧寒山曾在此住持,故更名为寒山寺。从元末至清末,寒山寺曾5次惨遭劫劫,但事后总能复建,生生不息。宋初节度使孙承曾重建七级浮屠,元末塔寺俱毁。明洪武年间重建,正统年间知府况钟再行兴修,清咸丰年间一夕化为灰烬。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苏巡抚陈夔龙始兴修,铸钟建屋以存古迹,宣统二年(1910年)继任巡抚程德全续修,规模宏敞,气象一变,额“古寒山寺”。新中国成立前寺遭受严重破坏,殿宇颓败,寺僧星散,一片荒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加强保护,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单位,拨款修葺,始复香火之盛。“文革”期间,佛像又遭损毁。改革开放之后,宗教政策逐步落实,寺院得以全面兴修。于是重塑佛像,增修丹墀,兴建殿阁,连接长廊,古刹得以重辉,寺貌为之一新,殿阁宏敞,佛像庄严,寺内还保存有许多珍贵的佛教文物。寒山寺殿宇大多为清代建筑,主要有大雄宝殿、藏经楼、钟楼、碑廊、枫江楼、霜钟阁等,佛像雕塑别具一格,雕刻艺术天下闻名。

人为之天,保护古城 大运河苏州段开挖于春秋时期,是中国大运河最早开凿的河段,苏州段沿线文化遗产众多,寒山寺就是闪耀在其中的一颗明珠。寒山寺坐落在苏州城西枫桥古镇,而枫桥镇正好紧邻京杭大运河。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发展,枫桥古镇的发展迎来了更多更好的契机,寒山寺也随着发展起来。宋代的范成大编

著《吴郡志》时说:“自古有名,南北客经由,未有不想此桥而题咏者。”寒山寺内诗碑名家手笔,蔚为大观,“古今碑刻,满目琳琅”。《枫桥夜泊》诗的石碑就有4块,分别为宋代翰林王珪、明代画家文徵明、清末朴学大师俞樾、现代书法家张继书写。乾隆《苏州府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枫桥,在阊门西七里,地与长邑和洽,为水陆孔道,贩贾所集,有豆市、米市、千石驻防。”民间有“预知豆米钱,打听枫桥价”的说法。枫桥繁盛的贸易为寒山寺带来了众多的香客、商旅人士及文人墨客,使得寒山寺名扬大江南北。

《大运河(苏州段)遗产保护规划》确定寒山寺为大运河申遗苏州段“10处历史遗存”之一。作为运河沿线重要的文化古刹,苏州共计有7个遗产点段一并列入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首批申遗名录,苏州因此成为运河沿线35个地级市中唯一以“古城”概称、念进行申遗的城市。自此,苏州的大运河申遗准备工作有序开展,使运河苏州段成为水上“文化长廊”。“枫桥铁岭大运河风水宝地,诗韵钟声寒山寺和合祖庭”,作为古典园林式寺院的代表,寒山寺日新月异,以十二胜景尤为引人瞩目:山门夕照、普名宝塔、寒拾问道、和合祖庭、寒拾遗踪、千年钟声、石碑长廊、塔影伴楼、华夏石碑、天籁响音、和合福道、枫桥夜泊。这十二胜景展现出寒山寺的历史遗迹、和合文化的特征,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现在的寒山寺已经成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寺院,海内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和合文化,交流融通 寒山寺文化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体,以佛教文化为主体,以和合文化为核心。佛门弟子一直认为,曾住持过寒山寺的唐代和尚寒山、拾得,分别是文殊、普贤两位菩萨转世的高僧,并把他们神化为我国的“和合二仙”,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神仙,成为“和合文化”的象征。

“和合”思想反映了人类对于和合、和平、和谐的不懈追求,“和合”既反映在城市与自然的和合共融,也体现为一种精神追求:礼让谦和、和谐共融,不仅追求个人的身心和谐,人与人之间、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的和睦共处,还求达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共生和处,进而实现与天和合、与地和合、与人和合的境界。“和合”思想与大运河文化的精神实质有相通之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新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文化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

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和谐,大运河文化作为一种活化石文化,其与中华民族精神同根同脉。大运河文化,“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潘承祥语)

在中外交流融通方面,大运河与寒山寺发挥了类似的功效。大运河以其包容性和开放性为中外交往提供了物质载体,大运河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向外传播的窗口,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对外交往和中外交流的前沿地区;中国邻近国家和地区以及西亚、欧洲、东非各国遣使团、商队通过运河来到中国;国外文化传播到中国,丰富了运河区域文化的内容;由于河流程经区域的富庶,运河区域成为内迁各民族、外国使者、商人、学间僧、留学生、各方人士的集中地。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物资和文化交流。苏州地处大运河与太湖流域的汇集点,在宋代就曾因经济文化发达而与杭州比肩,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清朝诗人陆游在《寒山寺》一诗中写道:“寺楼直与众山邻,鱼米东南此要津”,讲述了寒山寺偶依的运河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寒山寺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融通。《枫桥夜泊》诗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日本的小学生把这首诗作为课文来讲授和背诵。民间传说,拾得和尚乘了寒山寺里的一口钟,漂洋过海到过日本一个名叫萨埵的地方,传播佛学和中国文化。寒山寺大雄宝殿大殿前院两侧,有6棵五针松,就是日本爱媛县各界友好访华团于1976年4月10日栽种在该寺的。大雄主殿的右侧悬挂着一口铜钟。相传日本明治年间,有日僧山田润者,两度访华,挂搭寒山寺,与寺僧相处甚洽,后闻知古钟失落情况,曾发愿要找回此钟,归还原主,并自更名为山田寒山。归国后遍访日本列岛,查无踪影。于是发心募化重铸,又请日相伊藤博文为作铭文。铸成后,委托日本政府送往姑苏寒山寺。

如果说张继的《枫桥夜泊》的传世佳句对寒山寺起到了文因景传、景因文名、钟声诗韵、名扬百世的效果的话,那么,在大运河成功申遗这一共同愿景面前,大运河与寒山寺则像一对母子,他们具有诸多相通之处,他们都反映了一种生生不息、和合融通的民族精神。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白居易)。“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天,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细读诗人关于运河古渡——瓜洲的诗篇,不禁使人涌起对瓜洲的向往和怀念。历史上的瓜洲,是漕运要冲,古运河的入江门户。素有“江防要塞”之称,为兵家必争之地。但那个被军事家看中、诗人吟咏的瓜洲,其实在清末已被长江的浪涛冲塌殆尽。如今的瓜洲则是在清末民国时期重建的。人们要问,一个具有重要军事、经济、文化价值的古渡何以最终坍塌,消失在涛涛江水之中?

明代的瓜洲是一座城池,是与镇江同等重要的“第二重门户”,由于商贸发达,一度被文史学者称为运河漕运和盐运史上的“明星之城”,为何会在若干年后陨落长江中?近日,我市水利文史专家在为大运河申遗整理资料时,偶然发掘出多幅100多年前瓜洲坍入长江江心的《城河图》、《治水工程图》等,或将为读者解开这一历史谜团。

瓜洲“城”内街巷齐全,商贸发达

据《嘉庆瓜洲志》记载,古代“在江都县南45里,东至丹徒县连城洲,西至花园港,南至金山,北至扬子桥,东北至冯家桥,皆瓜洲巡检司所辖也”。疆域面积等于如今瓜洲镇行政辖区面积48.59平方公里的一半多。有关史料记载,瓜洲城镇形成于明代嘉靖年间。为了防范倭寇,当时的政府沿江两岸修筑了东西跨坝周1543丈9尺高、2丈1尺厚的“城墙”,后来历代修筑形成了环抱四周的城池。城内有关标志性建筑大观楼、文昌桥、拖桥,城河等。有文史专家考证,瓜洲的大观楼其实就是曹雪芹笔下《红楼梦》里的“风雪大观楼”,与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并称长江四大名楼。估计这也是今日瓜洲欲将其重建的要义所在。

《瓜洲续志》还记载:瓜洲镇城内外共共有14坊,其第九坊有民房数十间,史称“九城坊”。城内有东南西北4条主干道大街,另有街巷包括:镇庙大街、青石街、越河街、马家巷、并巷、黑巷、杨柳巷、郁家巷、铁锚巷等。由于水上交通便利,瓜洲逐渐成为商贸云集之地,史料记载:“每岁漕艘数百万,浮江而至,百州贸易干涉之人,往还络绎。”

与镇江同级,为“第二重门户” “瓜洲,原来是江边上的一個村子,后来由于扬子江(长江)的流沙冲积,到晋代的时候,逐渐‘长’出了一大块陆地。”扬州水利文史专家徐炳顺介绍,初形成的瓜洲状如一个“瓜”字,同时,漕河至此分为三支,亦似瓜字,故名瓜埠。开始叫瓜洲村,亦称瓜步、瓜渚、瓜埠。瓜洲地方虽不大,在古代却是兵家必争之地。《嘉庆瓜洲志》说:“瓜洲虽江中沙渚,然

始于晋,盛于唐宋,屹然称巨镇,为南北扼要之地。”著名地理志书《读史方輿记要》援引《江防考》(明万历二十七年)有这样的描述:“大江南岸圜山、北岸三江口,为第一重门户,而镇江瓜洲则第二重门户,仅真(征)天宁洲为第三重门户。”清代雍正年间江都县行政总辖6个“都”,每个“都”管辖12个“图”,时隶属江都县的瓜洲管6个“图”。城内还设扬子桥、皂角林、花家园等兵防部队“铺”,兵力总量超过100人。据说一般乡镇不能屯兵,只有地位重要的“关隘要地”才设置兵防。

清光绪年间,“明星之城”沉没长江

“瓜洲是运河漕运由扬州中转入江的重要门户和盐运出江要道。”我市文史专家李保华研究发现,自唐代开凿伊娄河,瓜洲就成了大运河的出江口、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也是漕运中转入北的门户和盐运的出江要道,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瓜洲堪称运河漕运和盐运史上的一座“明星之城”,却不幸在若干年后陨落了。

唐代中叶,瓜洲已与北岸相连,以致渡口淤塞,南宋以后,瓜洲距离京口(今镇江)愈来愈近。据说,站在瓜洲城楼上可以同金山上的人互相喊话。《读史方輿记要》记载:“唐宋以来,滨江周渚日增,江流日狭,宋时瓜洲渡口犹十八里,今瓜洲至京口不过七八里。”由于江中流沙不断淤塞,扬州与京口之间的舟船往来,要经过瓜洲沙尾,在大江里绕行60里远,不仅延长江航时间,而且漕船常被江浪涛淹没。为了确保漕运,唐开元二十五年,润州(今镇江)刺史齐瀚从瓜洲向北开凿了一条长达25里的运河,名伊娄河,又称新河、瓜洲运河。从此京口到扬州的漕船,不再绕道,既缩短了航程,又免除了风水之灾,而且每年的运

费大减。

“不断淤积导致径流改变方向,给瓜洲坍塌入江埋下了隐患。”邗江水利局高级工程师葛扣兵研究发现,明末清初,从仪征青山到二圩的江面上淤涨出北新洲、礼记洲、回龙洲、沙曼洲等江心洲,并逐渐连成,统称北新洲(即今世业洲),大江遂分为两汉,主流在北汉。

“江流北移,是后来瓜洲坍塌沉没江中的主要原因。”葛扣兵介绍,自康熙年间,瓜洲开始坍江,雍正末年,尤加厉害。虽经多次筑修,仍无济于事,到光绪二十一年,瓜洲全部坍入江中。

古渡瓜洲已陷,今日瓜洲却在重建,“运河拥抱扬子江,千年古渡四海扬”,新瓜洲乘大运河申遗之东风,定能重现古渡风采。

(选自《扬州日报》)



苏州寒山寺